

我是1983年到文艺报社的。记得那一天文艺报社专门开车来学校接我，我在北大的南门等着。于江开着文艺报社的吉普车过来，车停在大门口，老顾跳下车抢着为我搬行李。后来我才知道，老顾和于江都是文艺报社的中层领导。那时候，《文艺报》的领导都没有架子，互相之间都是同志关系，毫无隔阂，也从来不以官衔来称呼，年纪大的就被称为老某，年纪小的就被称为小某，显得特别亲切。我去文艺报社自然就被大家称为“小贺”。我在北大读书时是班上年纪大的，被大家称为“老贺”，一直叫了4年，听老贺都习惯了，没想到现在降格为“小贺”。我在文艺报社干了小20年，小贺也叫了20年，如今，见到《文艺报》的老同事，无论是比我年长的，还是比我年轻的，仍然是爽爽地叫我一声“小贺”。

文艺报社当时办公的地点是沙滩北街2号。沙滩北街2号应该是作家们很熟悉的地方，不仅文艺报社在这里办公，中国作家协会也在这里办公。这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几幢庄重的砖石大楼，但文艺报社和中国作家协会不是在这些大楼里办公，而是在院子里搭建了几排简易楼房作为办公的地方。文艺报社是一座单独的简易小楼房。上到二层的楼梯是悬在一面外墙上的，踏在楼梯上咯吱咯吱直响，但那时候并没觉得它有多简陋，每天踏着楼梯跑上跑下的觉得特别结实。二楼是一个会议室，中间摆了一张乒乓球桌，开会时大家围坐在乒乓球桌四周，也没有主次之分，想坐在哪里就坐在哪里。报社经常要在这里开会，编前会、务虚会、评刊会，还包括一些编辑部策划的文艺座谈会或研讨会等等，都安排在这个会议室举行。那些在全国有影响的理论家、批评家、艺术家们也踏着那架简陋的楼梯咯吱咯吱地爬上来。有一次开音乐座谈会，李谷一也来了，我们是湖南老乡，我特别想和她套套近乎。可是那次会议安排我做记录，还要整理出一个综述，我忙得不亦乐乎，竟根本没顾上单独和李谷一说上几句话。顺便说一下，那时候，不仅楼房简陋，一切的工作条件都是简陋的。我们没有录音机，更别提采访笔了，因此要靠编辑认真地做记录。会议室也没有空调，夏天就靠电风扇呼呼地摇着，冬天简易楼房四处透风，则必须穿着棉衣来开会。尽管简陋，但大家似乎都习惯了，从来没有谁抱怨过。许多重要的文学活动和文学选题以及一些重要的文章，就是在这个简陋的会议室里酝酿诞生的。

我那时候单身一人，没有家室负担，常常不分白天黑夜地泡在办公室里。报社对我也放心，下班后就将办公室的钥匙都交给我，随我使用。因此这里也常常成为一些年轻人聚集交流的地方，颇有些沙龙的味道，只不过是十分寒酸的沙龙。好在大家本来就不是奔着享受来的，聚在一起就讨论起最热门的话题。资料室的臧小平对我格外照顾，她悄悄给了我一把资料室的钥匙，下班后我就把自己关在资料室里学习。资料室里有一个书柜锁着，里面放的是一些港台期刊。当时政治还没有完全放开，这些期刊必须有一定级别的人才能看，文艺报社不在意这些规定，我们年轻人通过这些期刊打开了眼界。

潘凯雄是与我同时分配到文艺报社的大学毕业生（凯雄到文艺报社就被大家称为“小潘”，“小潘”的称呼也一直伴随着他），我们俩都被安排在理论组，他当时也是单身一人，在一起的机会就更多了，因为对问题的看法常常能够取得一致，所以就不妨合作一起写文章吧，这一合作就成为了一对固定的“双打”选手，一起合作了七八年之久，后来因为大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感觉不适宜写文章了，我们俩的合作才终止。当时不只是我们俩合写批评文章，文学批评界至少有七八对“双打”呢。8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批评“双打”，也许与当时的时代精神有着某种契合吧。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分析道：“那时候，我们被各种新奇的理论所震撼，这些新奇的理论也激活了我们的头脑，各种‘奇谈怪论’由此应运而生。我们聚在一起，就愿意‘高谈阔论’，每一个人都有新的想法和新的见解。相聚和讨论，成了80年代的文化时尚。‘沙龙’一词在当时并不流行，可那时候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有着大大小小的‘沙龙’式聚会，或者在我们的单身宿舍，或者在下班后的办公室，或者在某个周末的郊游，或者在某次会议的间隙。我们当时还年轻，旺盛的青春荷尔蒙甘愿挥洒在相聚和讨论上。我们讨论的话题固然从文学出发，但不时时会扩散到政治、哲学与历史，而扩散开去有时就收不回来，有时又回归到了文学。我们的讨论是热烈的，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心态则是平和的，谁都可以反驳他人的观点，谁同时也会认真倾听他人的申辩。当然那毕竟还是乍暖还寒的时代，我们的耳边不时还会听到政治的警钟在敲响，但这并没有太多地影响到我们的相聚和讨论，在这样的小环境里，我们感受到了心灵最大的自由，思想的激情在自由地释放。现在回想起当年的场景，才体会到那种心灵的自由是一种多么难得的精神享受！……还得说说我们在讨论中的态度，在刚刚经历了一个知识荒芜的年代后，我们开始参与到文学批评时，备感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这样的条件客观上带来了一种良好的讨论风气：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于是在讨论中，我们多半都愿意听到补充、修正、甚至反驳的意见，通过对这些意见的听取和消化，忽然就觉得自己思想更加完善和成熟。批评‘双打’就是有这样一种良好的讨论风气中悄然形成的。行文至此，我们在理由认为：批评‘双打’就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在当时自由平等的讨论中，想必会有其中的某两位发现互相之间更容易理解，思维方式相对接近，两人通过互相之间的切磋总会将思想观点变得更完美。于是他俩便说‘我们一起合作吧’。由此看来，促成一对又一对的批评‘双打’的外在条件是：自由的意志，平等的讨论，真诚的对话和互补的思维方式。这一切，应该同时也是80年代文化精神的重要内涵。”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凯雄的大量文章就是我们俩在沙滩北街2号反复讨论，然后趴在简易楼房的办公桌上一笔一笔写出来的，沙滩北街2号是安置我们心灵自由的地方。

沙滩北街2号的南端就是北大红楼的旧址。再往西去，便是故宫、景山、北海。老舍先生当年曾说过这一线是北京“最美丽的大街”。但当年在沙滩北街2号时，竟没有顾上好好欣赏这条大街的美丽，每天想的就是《文艺报》的选题和文学的风起云涌。后来文艺报社搬走了，中国作家协会也搬走了，我们在院子里的房子也不让保留，说要恢复这里的历史旧貌。有一天我又走进了沙滩北街2号的大院，想看看它的历史旧貌。哪有旧貌，完全把它修饰成了一个休闲的绿地园林。人们大概不会知道，这片绿地园林曾经是当代文学风起云涌的聚焦点。从这个角度说，沙滩北街2号毗鄰北大红楼旧址是一种缘分，因为北大红楼旧址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聚焦点。可惜的是，北大红楼旧址仍然矗立在那里，而见证上世纪80年代文学复兴的沙滩北街2号，只能存活在一些人的心里了。

那些年的《文艺报》

□范咏戈

有缺席，编辑记者们纷纷要求到抗震救灾、抗击非典、南方冰雪这些最艰苦的甚至有生命危险的一线，他们参与其中，及时编发稿件。我记得当时“非典”爆发，许多单位都不上班了，《文艺报》坚持上班正常出报；南方遭遇百年未遇冰雪灾难，《文艺报》及时发表了雷抒雁的《冰雪之劫：战歌与颂歌》，发表后得到中央领导批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后扩大了报纸影响。那些日子中的不少昼夜，报社同志吃住住在办公室，等新华社最新消息，打电话向各地约稿，一起为汶川遇难同胞默哀流泪，共同为北京奥运盛典欢呼——多难可以兴邦，国家如此，报社人也在攻坚克难中凝聚起精气神。为摆脱经济困境，报社前任想了很多办法，甚至一度将报纸一分为三，《文艺报》成为一张只有专刊没有正版的报纸，三个专刊由三摊人各自创收生存。炳华书记要求短期内改版，经过社内几次大讨论逐渐形成一些共识：报社经营不能离开办报。《文艺报》首先要放下“文艺界阶级斗争晴雨表”的包袱，高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邓小平四次大会上的《祝词》两面旗帜，团结老中青几代作家，坚持以理论批评为特色，办好特色版面，加强报纸的新闻性等。《文艺报》是为作家服务的，是为文学事业服务的，虽不是大众的，但即便是小众、专业的，中国文学界也需要这样一份报纸。在这样的共识下，报纸完成了改版。除加强了新闻版面，保留了特色版面，如理论与争鸣、文学批评、儿童文学、外国文学、



也正是在这样的润泽中，渐渐领悟了我们的前辈和兄长辈所铸就 and 践行的这一种学术底色。脚踏实地，扎扎实实，《文艺报》教育我这样面对编辑业务和学术活动，面对自己的人生。

如今，几十年过去，我初进《文艺报》时的前辈如冯牧、孔罗荪、唐因、唐达成诸公，甚至我的兄长辈如雷达、孙武臣，已先后仙逝。他们的音容笑貌，以及我有幸与之相处的种种，连同那一处简陋至极的所在，依然在我心底凝着浓浓的感戴。

足以勾连出那一时期的诸多难忘。

记忆中，为了容纳尽可能多的部门和属员，板楼的开间都不大，惟一的例外是二层西侧的会议室。一台乒乓球桌居中摆放，四围是密扎扎两环折叠椅，勉为其难地挤进报社的四五十号同仁。在这里，最经常召开也最让人着迷的会议，是以专司各种文艺门类、体裁的编辑，受命当众汇报最新的创作和理论批评成果动态。这样的例会于汇报者是展示自己对于最新创作和理论批评现象的掌握与梳理，于与会者则是一种殊为可观与难得的学术获得与交流。无拘无束的讨论，大大地提升了有价值的思考，进而促成了质地坚实的选题。正是这样的工作制度和学术流程，奠定了《文艺报》的学术性与权威性，也连带着培养了一支有能力开展独立的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编辑队伍。我一直相信，因为拥有这两方面的独门绝技，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所谓文学的井喷期，《文艺报》才能依然保持对文艺界的普遍关注与敬重。而我和我这一辈编辑，从地地道道的门外汉成长为差强人意的《文艺报》编辑，

2002年，我从外单位调入文艺报社工作。其实，我对《文艺报》并不陌生，从中学时代起就一直订阅。大学读的中文系，后来到《解放军文艺》当编辑，在文学这个圈子里逐渐了解了《文艺报》的历史和它在文学界的特殊地位。加之，我从云南部队调到北京《解放军文艺》后，原西南军区文化部老部长、有“文坛第一伯乐”之称的冯牧当时正主政《文艺报》，和这位前辈领导的接触又得以认识中国作协和《文艺报》的领导，如张光年、孔罗荪等，以及报社有名的“二唐”唐因、唐达成，还有冯牧手下得力的几员大将谢永旺、陈丹晨、吴泰昌、钟艺兵、阎纲、雷达、李炳银以及比他们年轻的骨干编辑、记者高洪波、潘凯雄、贺绍俊等。后来他们中有些成为了报社领导，有些调任其他单位成为文坛大咖。冯牧前辈给我许多参加《文艺报》活动的机会，也培养我成为《文艺报》的作者——似乎早已经融入在这个集体中了。

但是2002年真正调来并受命主持报社工作，情况却并不乐观。社会转型给“体制内”单位带来剧烈冲击，当时文学也已失去轰动效应，直接的结果就是发行量下滑，经济拮据。印象最深的就是上任第一周就被债主堵门，因欠印厂印刷费被告上法庭，报社败诉被强制执行，面临封账停刊。这让我意识到中国作协炳华书记在找我做任前谈话时说的“你是受命于困难之时”这句话的分量，也想起《解放军文艺》的老同事、先我一步转业到中国作协的雷抒雁说的“你是从米罗罗里来到糠窝窝里”，并非只是个打趣的比方。开弓没有回头箭，总不能让《文艺报》的牌子砸在我们这一辈人手上。报社穷，穷办公室20多年未装修过，办公室桌椅胳膊少腿，没有食堂，工资微薄；报社又很富，前辈给报社同仁留下的敬业、专业精神尚在。那些年接二连三遇上突发性事件和大事，2003年突然到来的“非典”，2008年南方冰雪、汶川大地震、北京举办第29届夏季奥运会，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等。在这些重大的突发性的事件中，《文艺报》没

《文艺报》的板房时代

□朱 晖

“文革”后恢复建制的《文艺报》，原是要人住朝内某处深宅大院的。有水榭，有假山，甚至还有可容纳百十人的电影放映室。如此豪华的规格，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即有“文艺界的红旗杂志”之称的《文艺报》，应该说还是殷配的。未成想，《文艺报》却阴错阳差地与这豪宅失之交臂，最终入驻了沙滩北街2号院。北面是文化部办公大楼，南面是著名的“五四红楼”，蜗居期间的一座二层活动板房，不仅成就了《文艺报》由复刊再到改为报纸的七八十年代，也成就了彼时的我们。

《文艺报》在文化部大楼内另有几间办公室，条件要好上许多，却统统分配给了理论、评论、艺术等业务部门。若以职位、声望、甚或只是依年岁和所谓惯例而论，报社的首脑们本不必如此调度。不过，从我1983年进入报社始直至报社迁离文化部大院，从未见领导们把这当作一种“德政”来宣讲，一众同仁更是不以为意，处之泰然。也许是简陋的办公条件从旁推近了报社同仁的间距，当时与我脚前脚后入职的青年人，似乎也从未有机会领悟板楼内的官威、官腔之类。在无拘无束的相处之中，在油然生成的信任与尊敬中，每个人都顺畅地融入了这个群体。仅凭这，那一处板楼，即

编采忆往

□包立民

1965年8月底，我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由此走上了编辑道路。从1965到1980年，我当了十多年电视编导。20世纪6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引进了电视传播媒体，开办了全国第一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我在大学中文系，学的是文学，而且是古典文学，不知为什么，毕业分配时，北京电视台人事处的老刘到学校里来“乱点鸳鸯谱”，把我点到北京电视台，令我哭笑不得，又不敢提出意见。但工作多年后，我发现自己不太适应这种“大兵团”作战的工作方式，加上“文革”的特殊政治环境，我这个电视编导，编导了十多年，却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记忆的电视节目，可谓乏善可陈，愧对电视观众。

1980年夏，我毛遂自荐到《文艺报》另谋新职。当时正值改革开放，百废待兴，《文艺报》急需编辑人才，征得有关方面的同意，我几乎没有费什么劲，就调进了大学时代早已向往的《文艺报》工作。复刊初期办公条件很差，连正规的办公室也没有，只能在沙滩借文化部、《红旗》杂志大院的一块宝地，因陋就简搭建了几间木板房办公，与财大气粗、名声挺响的电视台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复刊后的《文艺报》，招纳了十多位有志于文艺事业的中青年编辑人才，其中有些都成了中国作家协会和宣传部门的骨干，也成了文科学子心目中的“龙门”，坊间流传着调侃《文艺报》，犹如鲤鱼跳龙门，故有“一入龙门，身价百倍”之说。但我非精英骨干，也无“身价百倍”的感受。虽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找到了归宿，终身可托之感。《文艺报》的编辑工作，相对电视台来说比较宽松，又遇到了开明的上司，可以说如鱼得水，又编又采又著，左右逢源，得其所哉。从这个角度上说，没有《文艺报》，也许没有我的今天。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病逝于台北。消息传来，文化部、中国文联闻风而动，委托中国美协、中国画研究院、中国美术馆联合筹办“张大千遗作展暨张大千艺术研讨会”，并将“研讨会”主持人的任务落实到张大千的老友、中国美协副主席叶浅予的身上。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张大千作品第一次在中国美术馆亮相，也是中国官方第一次主办名为研讨、实为纪念性质的“研讨会”。我作为《文艺报》的一名记者，自然近水楼台。征得了叶浅予先生的同意后，我前往采访。

6月初的一个下午，我来到东城区甘雨

胡同的叶老家中，年逾古稀的叶老刚从济南讲学归来，风尘仆仆，白发苍苍，但双目炯炯有神，十分健谈。交谈中，他发现我对张大千的艺术活动知之甚少，惊讶地问我多大年纪？我回答说刚过不惑之年。他扳动手指，睁大眼睛问道：“40来岁，怎么知道大千这么多事？”我告诉他，因喜欢张大千的艺术，又对他的传奇人生深感兴趣，所以在京城张氏的门前、友人处多方采集他的奇闻轶事。他听了大为高兴道：“真没有想到《文艺报》还有这样一个人才。”然后用手拍了一下画案说：“我正在筹备一个研讨会，你熟悉人头，就来做我的联络员，组织这次会务活动。”说完，不容分说，初次见面，就给我分配了任务。

访谈归来，我整理了4000多字的《叶浅予谈张大千》专访，刊登在七月号《文艺报》上。6月13日，研讨会如期在中国美术馆东厅举行，会后要求我把发言稿整理成文，还要我向未能到会的张氏友人、门人诸如谢稚柳、何海霞等人约稿，并编辑成书，联系出版社发行。我遵照吩咐，在他的指导下，又在黄苗子先生的协助下，很快编辑成《张大千的艺术》一书，交由三联书店出版。

由专访到编书，我与叶老结成了忘年交。在我的心中，叶老早就成了我的私淑老师。我私淑他刚正不阿的铮铮铁骨，私淑他自强不息的治艺精神，还私淑他对现当代美

术作品的精当评论。叶老逝世后，我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我的私淑老师》，以缅怀纪念。

1985年7月，《文艺报》决定把月刊改成周报，使它名副其实成为一张报纸。办报不同于办刊，办报强调时效性、新闻性、知识性、趣味性，但《文艺报》原旨是刊发文艺评论、理论文章，突出学术性，与办报方针似有不同，怎么办？于是加强新闻版面，增添副刊版。好在是周报，一周四版。我在电视台搞过新闻编采，无意中派上了用处。

前面提到我因专访叶老，结缘成了忘年交。我从他的艰苦创业学到了不少编刊经验，同时也结识了他30年代在京城的一些老漫友。1986年3月底，上海老漫友张乐平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闻讯后，我与叶老商议，可否组织一帮京沪老漫友到《文艺报》座谈聚会，谈谈漫画创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叶老点头同意，马上决定出席人名单，由我分别通知。4月2日，《文艺报》邀请了11位京沪两地的30年代老漫友，在沙滩中国文联会议室参加座谈会。

老漫友中，9位定居京城，两位定居在上海、无锡。这些老漫友平时往来不多也不易，这次聚会，白首话当年，兴致很高。座中年龄最大的要数鲁少飞，时年85岁。他是当年多产的漫画家，又是《时代漫画》的主编，当时培养提携了不少漫画人才，大家对他十



1986年，老漫友相聚《文艺报》，叶浅予赠原发《文艺报》1984年4月19日第4版